分点。此外，孤独也会影响人们的血压和免疫系统健康。  
　　城市孤独病感染的不仅仅是都市人。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被留在家乡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同样面临孤独的心理困境，形成“城里城外都孤独”的局面。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汹涌而来的孤独大潮，英国任命“孤独大臣”绝非小题大做。不少国家都在努力帮助人们走出孤独困境。治疗孤独症，最根本的是让孤独者与社会建立联系，形成有效沟通。在日本，一些非营利组织专门收留孤独人群，让他们过上集体生活，重新找到归属感。  
　　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克里南伯格曾指出，社会交往的质量而非数量决定我们是否感到孤独。城市的本意是让生活更美好，不让城市成为心灵的孤岛。克服孤独问题，需要孤独人群发挥主观意愿，也需要社会积极施以援手，释放温暖。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2月5日电  （记者聂云鹏、王薇）科威特最大的博物馆群——谢赫阿卜杜拉·萨利姆文化中心5日晚举行揭幕典礼，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参加了典礼。  
　　据介绍，谢赫阿卜杜拉·萨利姆文化中心占地约13万平方米，是科威特最大的博物馆建筑群，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技术博物馆、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博物馆和太空博物馆，共计有22个展厅，展出1100多件展品。此外，文化中心还建有艺术中心、剧院、餐饮设施等。  
　　据悉，文化中心采用先进技术打造身临其境的仿真环境，并通过大型模型和趣味互动等方式，为游客提供全新的参观体验。  
　　中华文明5000年的说法可谓妇孺皆知，耳熟能详。近年来，一种新的说法见诸报刊：中华文明具有8000年的历史。  
　　提出中华文明有8000年历史观点的根据是：在距今8000年前，中国的史前文化已经取得十分显著的进步，进入了文明。  
　　大约1万年前已经出现的稻作农业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初步发展后，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增加，各种手工业技术有很大提高，原始宗教、祭祀等精神层面的活动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一定数量的栽培稻，一些墓葬墓主人的腰部发现随葬多个骨甲，里面装有多粒小石子，被认为可能是系在腰间，在举行祭祀时发出响声，类似于后来萨满身上系着的铜铃。在少数龟甲上还发现了刻画的符号，其结构与商代的甲骨文不乏相似之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少数墓葬中，还随葬了用鹤类的翅根骨制作的七孔骨笛。经过音乐家试吹，音阶相当准确，完全可以演奏乐曲。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笛子。  
　　在距今约8000年的内蒙古赤峰市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栽培粟和黍，表明粟作农业同样在经历2000年的发展之后，取得重大进步。在这个遗址少数墓葬的墓主人头部附近，出土了玉制的玉玦（耳环）和一件条形玉吊坠。这些玉器玉质为软玉，表面十分光滑。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辨认出这类玉料，并且掌握了琢玉的工艺和技术，开启了中华民族爱玉传统的先声。  
　　那么，是不是有这些考古发现就可以认为当时已经是进入文明了呢？  
　　关于文明，国内外有各种见解。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是：  
　　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由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发展成为不同阶级，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文明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的总和。  
　　物质文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主要是指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是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以及文化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制度文明是文明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国家政体、社会的权力结构、管理系统、政治制度等。  
　　文明形成的标志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达到一个新的水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进入文明社会。其特征是：社会的阶层分化加剧，出现阶级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王以及为维护其统治服务的职业官僚阶层，社会各个阶层的等级及其人们的行为规范被制度化，出现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根本标志。  
　　文明形成在考古学上可以找到表征。我参与领导、进行了15年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辨识的标准：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手工业尤其是高等级的物品的生产专业化，出现了需要组织大量劳动力修建的大型公共工程（通常是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巨型都邑，也有些地方是防止水患的大型水利设施），都邑中出现权贵阶层居住的高等级的建筑区——“宫殿”，出现了规模超群且有大量随葬物品（特别是表明墓主人高贵身份的物品——“礼器”）的大型墓葬，王权控制重要的资源，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出现比较稳定的区域性政体等等。  
　　在8000年前的中国史前时期，虽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社会整体上还是一个较为平等的原始社会。刚刚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分化的端倪，远远没有达到明显的阶层分化，更不要提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所以，当时的社会只是开始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也就是文明起源的开始，距离进入文明社会还相当遥远。  
　　在距今5500至5300年前后，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严重的阶层分化，形成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位于社会最顶层的首领——王，掌握军事指挥权和祭祀神灵的权力，掌控高等级手工业（如琢玉业）的生产，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他们组织动员数以万计的人力修建大型公共设施（如城池、大型水利工程），住处与一般社会成员居住区相隔绝，他们的墓葬往往有着数以百计的珍贵随葬品（一般是制作精美的玉器），尤其是一定随葬表明其高贵身份的礼器。他们控制住较为固定的区域，区域内有若干臣属被他们的下级贵族分别掌控，这些社会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形成初期的国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这些政体为“邦”或“国”，如“禹会诸侯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据此，可称各个区域的这些初期文明为“邦国文明”。从这些区域性的初期文明的形成时期算起，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  
　　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阶段。我们说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是实事求是，是尊重历史真实。她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为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持续而独特的贡献。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第七届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科评议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科评审组组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研究院终身外籍院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负责人。《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和第三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主编。  
　　经国务院审批，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见证。作为5000年前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它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实证了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  
　　我常常想5000年会是多远？如果以25岁作为一代生命的接续，从今天回到5000年前，我们前面只排着200个人；如果生命记忆以50年为单位可以对接传承，那么回到5000年前，在我们前面只站着100个人，仿佛一眼就可以望到。但一代一代过去，在我们个人记忆里，我们往往只记得爷爷的样子。再往前通过史书，我们可以知道唐宋，知道孔子，知道大禹治水。关于人类更早的记忆，那便是神话传说。而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和许多重要发现，逐渐建立起人类的史前史，从而彻底改变了创世纪的宗教史观，使人类重新客观地认识自己和我们所在的星球。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是坐井观天般活在想象中，我们越来越明白自己的时空坐标和文化坐标，5000年其实并不遥远。  
　　5000年前的古代王国  
　　考古是一项需要积累的事业，我们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路，不断地探寻和发现，从那些古人留下的遗迹和遗物中触摸凝固的时间，用心感悟祖先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处的时空中的一切。  
　　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对良渚遗址的发掘，正是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黄河流域所取得成果的影响下进行的，是近代考古学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次成功尝试。施昕更先生的发掘以及他撰写出版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代表着良渚文化研究的开端。直到1959年，良渚文化才被命名。良渚的玉器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发现，但直到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玉琮、玉璧和良渚的陶器一起出土，大家才意识到这些玉器可能是4000年前的。  
　　而对良渚文化的认知真正达到新的高度，是从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的。  
　　三十几年的考古生涯，使我有幸能不断踏上良渚人的土地，一次次地接近他们的生活，每一次新的考古发现与认识上的突破，都令我激动不已。  
　　1986年我们第一次在反山发掘到良渚的贵族大墓，那些精美的玉器将我们带回到5000年前神王的世界；  
　　1987年瑶山的发掘，我们第一次发现了良渚人的祭坛以及埋在祭坛上的贵族墓地；  
　　1991年我们又在汇观山发掘到与瑶山一样的祭坛与墓葬；  
　　1992年莫角山遗址的发掘，那片夯筑考究的沙土广场的发现，让我们相信这里就是王者们曾经居住过的宫殿；  
　　2006年葡萄畈村庄下的那片石头，开启了我们寻找王城的大门，2007年我们依次发现了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当11月我们最终发现南城墙时，这座被历史的泥沙淹没了4000多年的王城，就真的在我们脚下。  
　　从2009年彭公岗公岭水坝发现起，我们的视野被引到距离良渚古城十几公里以外的苕溪上游，开始对古城外围治水工程调查研究。经过5年的调查勘探与发掘，至2015年初步搞清水坝的分布、年代与堆筑情况。发现的11条水坝在古城上游的西北部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水利体系，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综合功能。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直接保护了当年王城外围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  
　　在2015年老虎岭的发掘现场，我们选其中一条水坝，利用当地百姓取土破坏的剖面进行铲刮，草裹泥堆筑的方式在今天依然可以见到。另外在良渚时期的灰沟里面出土了良渚文化陶片。这样我们就有两重证据，一个是碳14测年，一个是地层叠压的证据。碳14的年代集中在距今4700年到5100年之间。后来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实验室对7条坝做了碳14测年，获得了6条水坝的数据，都集中在这个年代。  
　　也就是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对于良渚遗址和良渚古城的认知，我们已不再是盲人摸象般的猜测。尽管辉煌的宫殿已经灰飞烟灭，但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的景象仿佛历历在目：以宫殿为主的王城有3平方公里，王城外围核心居住区有5平方公里，水利系统所直接保护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良渚已不仅仅是一座城，而是一个古代王国。这是一个5000年前何等辉煌的古代王国。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现在我们就有证据了。  
　　追寻远去的文明  
　　5000年前是一个平台，世界各地陆续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古埃及、苏美尔及古印度都是在这个时间形成王国阶段，现在我们中国也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文化。单从水坝修建的工程量的角度、玉器雕琢的精细程度与墓葬的等级分化，都可以证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是不低于其他文明的。  
　　在卫星图上可以看出，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面积几乎是尼罗河三角洲的两倍。独特的玉器是良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代表，反映了一个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那个著名的神徽图案在整个太湖流域都非常的一致，有着类似标准化的制作工艺，这说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着统一的信仰崇拜，而良渚玉器系统的产生，主要体现了巫师和神权的力量。良渚文化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权杖设计。林沄老师的《说王》里面专门论述了钺跟王的关系，王是由钺字转化过来的字，也就是说在5000年前设计权杖的时候，除了象征王权之外，还在权杖的上面戴了一个神的帽子，具有君权神授的意思。  
　　还有良渚玉琮。它经历了从圆到方、鼻线加高的演变过程。玉琮后来被用到天圆地方——“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概念中，实际是用了良渚玉器后期的概念，而良渚早期的圆形玉琮，主要还是一个神像载体的概念。在良渚时代稍晚的龙山时代，陶寺遗址的玉器显然也受到良渚玉琮的影响。延安卢山峁的玉琮从质地和做法都与良渚文化比较像。石峁古城遗址在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玉器里面就有良渚晚期被切成片的玉琮。从殷墟妇好墓到金沙遗址，都有玉琮发现，都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都说明良渚文化在晚期已经扩散到一个很大的范围，对诸多区域的文化产生过影响。  
　　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不曾断裂的过程，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良渚多年的考古发现和对玉器的精密充分研究，都证明着这是个一脉相承的文化概念。  
　　良渚的故事一直讲到今天  
　　考古让我们不断地回到从前。作为一个考古者，也许是辛苦的，因为要不断地往返于时间两端，同时活在古代和当代。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也是幸运和幸福的，因为我们的心常常可以在不同时空遨游。当一扇扇门打开，当我们穿越时间隧道，渐渐地熟知一片片远古的天空，我们会越来越感觉到生命的充实与久远，仿佛自己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甚至几万年。  
　　在大雄山与大遮山两山之间，100多平方公里的山间平原上，沧海桑田，繁华与孤寂，一幕幕从眼前闪过：  
　　1万多年前，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冰期结束了，我们的祖先从旧石器时代的洪荒中走来，开始了农业与定居的生活。  
　　从距今约7000多年到5300年前，这里还只有山边上几个小村落；5000年前某一天，良渚的先王们率众从太湖之滨走来，在这里开始修城筑坝，于是有了良渚1000年的繁华。  
　　4000多年前那场滔天的洪水，淹没了一切，只留下大禹治水的传说。  
　　直到2000年前大汉帝国的子民们再次来到这里，山坡上与良渚古城的宫殿高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墓葬；  
　　800年前的宋代，这里是有名的亭市镇，以烧造一种釉陶酒瓶——韩瓶而著名，如今在瓶窑镇中学的后山上还可以看到大量窑址堆积。我们在姜家山墓地边上发现过一座宋代的房屋遗迹，房子周边到处可以看到宋人丢弃的韩瓶，这里也许是当年亭市镇最东边的一座酒肆，那时的他们已经不知道身后这座低矮的荒山，曾经矗立过5000年前的宫殿，他们也不曾想到，自己的房基下埋藏着5000年前贵族的墓葬……“五千年并不遥远，穿过那间宋代酒肆的残垣断壁，从汉代人的墓地经过，我们便可望见五千年前的篝火……”这是我在发现当晚写下的诗句，也是最真实的感情流露……  
　　（作者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图片为作者提供）  
　　制图：蔡华伟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作为中国人辞旧迎新的节令，春节最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精神理想、生活愿望和审美取向。除了放爆竹、点烟花，人们还沿袭着迎祥纳福、岁岁遵循的重要习俗——贴年画。  
　　源自民间的年画洋溢着质朴的喜气，散发着真挚的情感，是中国百姓精神天地的可视化呈现，勾勒着民间生活的“理想国”。它根植于泥土、活化于生活，最贴近生活的本质和创作者的本真。我国不同地域的年画呈现出不同风格特征和艺术气质，杨柳青的清秀、桃花坞的典雅、朱仙镇的粗犷、凤翔的浪漫……年画丰富着民间创作的智慧宝库，也展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美、民俗美的多样性，成为不容忽视的民间文化遗产。2002年以来，木版年画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龙头项目进行持续的全方位、大规模田野普查；2006年，桃花坞年画、杨柳青年画等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美在民间永不朽。年画是一门“刻版”的艺术，但并不刻板，它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木乃伊”。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作为守正与创新的源泉，延续着千年文脉。  
　　“我愿尽我所能，将毕生所学教给学生。若能培养几个接班人，让桃花坞木刻年画持续地发展，我便心满意足”，房志达如是说。这位83岁高龄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至今还坚守在年画制作与教学的一线。  
　　2001年，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划转到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以校企合作的“桃花坞模式”培养年画传承人，在全国工艺美术高等院校中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先河。而早已到退休年龄的房志达被返聘到学校，手把手带起学徒，身手相传。  
　　与五彩油墨、洁白宣纸结缘六十余个春秋，站在印台边手握棕刷成为他一生不变的姿势。14岁，他便进入当年著名的老字号“王荣兴溶记年画铺”学艺；耄耋之年，他依然思考着年画的未来。“只有不忘传统，又融合时代需求和市场变化，才能使非遗更好地走上复兴之路。”  
　　事实上，青年一代的年画传承人的确在实践中丰富与拓展着传统年画的题材和视觉表现形式——故事新编、旧瓶新酒，为传统年画赋予时代审美及现代观念。比如，房志达先生带领几位80后、90后新生代弟子历时108天全手工雕刻，印制完成的木版年画动漫作品《唯我国风·天涯明月刀》，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认可和喜爱。  
　　当今人们希望从历史长河中打捞一些真实的碎片来重现优雅、精致的苏州城市生活，来回顾和展望民相亲、心相通的文化传播交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桃花坞年画的价值不言而喻。如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言，“姑苏年画曾是世界认识苏州的迷人窗口，未来将是苏州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它曾是古丝路上联系欧亚文化的一条纽带，未来将是各国之间友好的桥梁，为‘一带一路’各国之间共同的文化繁荣做出新贡献”。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换酒钱。”这首诗使桃花坞声名鹊起，人们因而习惯将苏州年画称为“桃花坞年画”，又被称为“姑苏版”或“苏州版”。桃花坞年画产生于明代，它继承宋代雕版印刷工艺，同时吸收明代版画的优点。它在清雍正、乾隆年间迎来鼎盛期，年画质量与数量空前提高。再将视野放之世界史的角度：17世纪，姑苏版画成为中日贸易中绘画交流的重要内容，借此，日本浮世绘的美学风格受到桃花坞年画深远影响；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开放海禁，姑苏版画经由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商人及船员以贸易方式销往欧洲，逐渐在欧洲兴起的“中国风”浪潮中成为备受青睐的艺术商品，而中国民间图像所代表的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19世纪前欧洲的审美……  
　　借古观今，时至今日，桃花坞年画要持续发展，也亟须将视野从“坞内”延展到“坞外”，扩充性地展示和收集桃花坞年画各时期的真品、绝品，将当今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桃花坞年画创作中，与国内外年画收藏家、研究者、技艺传承人共同培本开源。  
　　在近日举办的“中国·苏州首届国际木版年画展”暨“传承·创新·交流——中国木版年画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展览不仅展出来自英国、日本和韩国的清中期前的姑苏版美人、盛景和百子系列版画，各国专家还围绕姑苏版画在海外的收藏和研究、中外年画的非遗保护路径等问题展开讨论交流。  
　　英国伦敦著名书店“寒山堂”收藏有传世数量最多的姑苏版画，这次展出的12幅美人图和盛景图版画带有西洋透视法和铜版画线刻技法，见证了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洋风姑苏版创作和外销的鼎盛面貌。而“寒山堂”创始人、从事书店经营25年之久的冯德宝（Christer von der Burg），致力于中国年画收藏超过30年。他认为图画能让人快速直观地了解中国文化，“我也收藏中国当代版画，希望从中看到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  
　　更令人欣喜的是，保护传承年画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事业。东湖木版年画被列入越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阮登心是东湖木版年画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的展位前不断有观众前来询问，中国观众的热情令他颇为感动。他说：“木版年画是中国、越南等国家共同的文化遗产，也是一种让其他国家直观了解东亚地区文化的方式。我们应当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携手将这份文化传承下去”。  
　　这个春节，我们不妨放下一整年的行色匆匆，在身边寻一寻年画的踪影，重拾文化的记忆。年画应被更多人关注，因为它不仅仅是“年的画”，也不仅仅表达对年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标注地域审美个性、寻觅生活情感源头的一种索引，是全人类应合力守护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方年画，藏着浪漫的故事和深刻的寓言，也藏着我们精神的故乡、文化的乡愁，它根植于人们心灵深处的艺术土壤，成就着剧变时代中不变的美的延续和文化自信。  
　　距离中国女排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夺冠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有两名当时的主力队员也已经结束了运动员生涯。继魏秋月去年退役，惠若琪2月3日也在江苏常州宣布退役。  
　　2017—2018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目前接近尾声，新一届中国女排集结的号角即将吹响，哪些新人能够担起重任，在2018年世锦赛、2019年世界杯、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女排续写辉煌？  
　　老将相继退役，队伍要面对新老交替  
　　女排是中国三大球中唯一夺得过世界大赛冠军的队伍，中国女排是一种情结，承载着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所以中国女排的一举一动都牵挂着国人的心。无论是去年魏秋月的婚礼，还是前几日惠若琪的退役仪式，都吸引了许多球迷的目光，甚至不少人关心惠若琪退役后的人生规划。  
　　惠若琪的家庭条件很好，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支撑她熬过艰苦训练与伤病的，是一份对排球纯粹的热爱。27岁正是球员的黄金年龄，如果不是残酷的伤病，惠若琪绝不可能这么早离开她心爱的排球。  
　　“排球是我的信仰，是我对生活的态度。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一直以来热爱的事业。”惠若琪在退役仪式上的告白，既是对自己运动员生涯的感叹和总结，也是对年轻队员的寄语。只有热爱排球事业，并为之付出一切，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惠若琪作为主攻，是中国女排队员当中技术最全面的一个，她在一传和后排防守环节的表现尤为突出。正是惠若琪、魏秋月和朱婷等优秀队员在里约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才能保证中国女排最终的夺冠。  
　　如今，魏秋月和惠若琪已经正式退役，同为1987年出生的徐云丽和颜妮，因为年龄或伤病等因素，可能也不会坚持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跟随中国女排夺得里约奥运会金牌的其他队员，也许有人会因为伤病或者水平下降，无法入选新一届的中国女排名单。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新老交替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也是目前中国女排必须面对的现实。  
　　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涌现一批新锐球员  
　　令人可喜的是，虽然魏秋月、惠若琪等老队员退役，但朱婷、张常宁、袁心玥、丁霞等正处当打之年的队员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与此同时，李盈莹、陈佩妍、王媛媛、高意、王梦洁、胡铭媛、宫美子等一大批新锐，也在中国女排超级联赛中脱颖而出。她们的亮眼表现，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女排未来的希望。  
　　里约奥运会前夕，郎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感叹，除了朱婷的主攻位置无法撼动外，任何位置的主力人选都无法确定，谁表现好谁上。  
　　本赛季的女排超级联赛，在主攻、接应、副攻、自由人位置上都涌现了一批非常有潜力的新秀。  
　　作为一名少见的左手选手，即将年满18岁的李盈莹，既能够胜任主攻位置，也能够承担接应的责任，加上她1米92的身高，是一名潜力无限的后起之秀。她以单场45分打破了此前由朱婷保持的国内女排联赛得分纪录，目前联赛总得分和扣球得分都高居第一，出色表现得到排球界的一致好评，将是新一届中国女排进攻端不可或缺的人选。  
　　里约奥运周期，中国女排在接应位置上始终没有非常出色选手。如今，只有18岁、身高1米95的左手接应陈佩妍，入选了中国女排去年最后一期集训大名单，她在力量和爆发力方面非常出色，是中国女排在接应位置上的重点培养对象，训练中她更是得到郎平的特殊关照。经过国家队短暂的集训后，陈佩妍在本赛季联赛中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  
　　新赛季的女排超级联赛，除了在主攻和接应位置表现出色的李盈莹